

# “涵化”与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

吴宁, 晏兆丽, 罗鹏, 刘建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 岷江上游不仅是中国的一条重要生态过渡带, 同时也是历史上一条民族迁移的“走廊”和交汇地带。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家的重视, 但在具有同样保护意义的文化多样性方面, 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本文从文化的涵化概念出发, 以岷江上游的民族迁移为线索, 分析了该地区民族文化的涵化现象。并将涵化作为文化多样性形成的驱动因素, 分析了涵化在文化多样性形成中的作用与机理, 以及涵化与民族地理分布的关系, 指出了民族地理分布与自然生态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关联性。

**关键词:** 岷江上游; 涵化; 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 G03; G07

**文献标识码:** A

岷江上游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峡谷地带, 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支流之一, 其流域范围包括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黑水及都江堰市行政所辖区域的全部或部分地方, 总面积 23037km<sup>2</sup>, 人口 37 万余人。历史上这里就是一条民族迁移的“走廊”和交汇地带, 在人类地理学研究上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过去的 20 年中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土地利用和区域发展等均进行了不少研究, 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sup>[1]</sup>。然而应该看到, 虽然目前的诸多保护工作已将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列为同等地位<sup>[2]</sup>, 但过去对该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及其形成历史还缺乏应有的研究。

岷江上游地区正处在中国东部季风湿润区和青藏高原区的过渡带上, 对该区域的生态脆弱性特点大家已有了一致的认识<sup>[3]</sup>。但同时人们也发现, 这条特殊地带的过渡性不仅仅表现在生态特征上, 还表现在经济文化方面, 即岷江上游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区与游牧文化区的交汇面<sup>[4]</sup>。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里, 千百年的民族交融导致了最终的文化

涵化, 从而也导致了该区域民族对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特异性。因此, 要推动该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了解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多样性背景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国在文化涵化现象方面的研究工作还不多, 本文将以涵化现象的分析来说明区域文化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 1 涵化及其研究历史

涵化(Acculturation)又称文化潜移或文化移入, 它是指不同文化群体通过直接与不断进行交往而传播文化的过程, 其结果是导致一方或双方的文化模式发生变化, 一种文化接受其它文化的要素, 及对另一种文化的适应, 从而使不同文化的相同性日益增强<sup>[5]</sup>。这一持续的过程可能包括三种反应形式: (1) 接受, 即一组文化特质对另一组文化特质的全部或某一部分内容进行吸收或取代。(2) 适应, 即把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吸取来的新文化特质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协调起来; (3) 冲突, 即对外来的文化加以拒绝或排斥。

收稿日期(Received date): 2002- 11- 10; 改回日期(Accepted): 2002- 12- 30。

基金项目(Foundation item):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大项目(KSCX1- 07)、国家“十五”攻关项目(2001BA606A- 05)资助。[The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KSCX1- 07) and the national key project of the Tenth Five Year Plan(2001BA606A- 05)]

作者简介(Biography): 吴宁(1964- ), 男(汉族), 四川成都人, 研究员, 德国洪堡学者, 1995 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高山和亚高山植被生态学、恢复生态学 and 可持续发展研究。[WU Ning (1964- ), male(Han Chinese), born in Sichuan, China. Professor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95 got his Ph. D. in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FU Berlin), Germany, and then became research fellow of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Humboldtian) in 1999; research fields mainly covering alpine and subalpine vegetation ecology, restoratio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ountainous region.]

涵化的概念首先见于十九世纪后期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著作中。早在 1880 年,后来任美国地理测量局局长的 J. W. Powell 就提到,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文化群体通过“涵化的力量”大大改变着土著传统<sup>[6]</sup>。在这段时期,一些德国的地理学家开始研究涵化的过程。德国人类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F. Ratzel,在其 1891 年出版的《人类地理学》一书中,就探寻了文化相似性之间的历史联系<sup>[7]</sup>。此外,在美国早期人类学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德裔美国地理学家 F. Boas (1896) 开始把涵化与空间扩散(spatial diffusion)的概念结合起来<sup>[8]</sup>,使涵化的概念得以扩展和引深,并称之为互为影响的文化在彼此趋同时的改变过程。这一解释在德国人类地理学家中也有很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早期北美的人类学家越来越多地涉及于涵化的过程。不过,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那些消亡了的文化,如 R. H. Lowie's (1935) 对克劳印第安文化的经典研究<sup>[9]</sup>。对于当代文化领域的涵化研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得到了发展。如 M. Mead (1932) 在早期研究中对印第安人与盎格鲁-美洲人、土著非洲人与欧洲人接触中的具体调查<sup>[10]</sup>。也就是在这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指定了一个以 R. Redfield 为首的委员会来确定涵化的研究领域。按照 Redfield (1935) 所给出的定义<sup>[11]</sup>，“涵化应理解为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是由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持续地直接接触,造成二者之一或双方原有的文化类型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随后的 25 年当中,涵化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大量增加,特别是在新大陆黑人文化的分析方面,美国地理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到了 50 年代, C. Sauer (1952) 从文化特质的空间扩散角度对农业文化的相互涵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sup>[12]</sup>,他提出“在人类的历史中,思想从少数中心区域扩散是一种规律,而与其独立的、平行的创造则是十分例外的情况。”后来, T. Hagerstrand (1967) 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扩散模型<sup>[13]</sup>,并概括总结出与涵化过程的关联性。

近三十年来,地理学家们更多的是关心与民族地理有关的涵化研究。E. Bjorklund (1964) 分析了群体思想意识与其涵化之间的广泛联系特性<sup>[14]</sup>,而 John 和 J. O. Wheeler (1969) 研究了涵化与群体分布格局之间的关系<sup>[15]</sup>。通过对几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他们探明了影响涵化速度和水平的主要因素,并

分析出这些因素与群体聚集或扩散趋势的关系。C. Jayawardena (1968) 研究了各种群体在不同规模上的涵化特征<sup>[16]</sup>,他考察了与许多海外印度社区变化有关的涵化因素。长期以来,涵化一直是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中国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之间、各民族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涵化的内容。同时,涵化的作用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碰撞过程与生物区系的交融有着类似的道理,多样性往往存在于交叉过渡区域。

## 2 岷江上游的民族迁移与地理分布

涵化与民族的交融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岷江上游民族的会聚无不与历史时期民族的迁徙有关。岷江上游地区主要分布着藏族、羌族、回族及汉族等多个民族。据文献记载,新石器时代岷江上游地区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公元前 310 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统一巴蜀,置蜀郡,在岷江上游设置湔氐道<sup>[17,18]</sup>。同时,考古发掘也表明,在秦末汉初岷江上游地区就已有土著居民开垦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从游牧渐而转向定居<sup>[18]</sup>。但这些原住民并没有形成今天岷江上游地区民族的主体,而是迁移群体及其相互影响后形成的新文化群才是今天的主导。

### 2.1 岷江上游的民族迁移过程

#### 2.1.1 岷江上游的羌族

羌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影响深远的民族之一。现主要聚居在岷江上游的茂县、汶川及理县、松潘部分地区。据汉文文献记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叶,在岷江上游两岸已分布着许多土著人在那里游牧(旧史籍也有泛称为羌的)<sup>[17]</sup>。但应该看到,岷江上游的羌族主要系秦汉时期从河湟一带迁来的羌人与当地原有居民融合而成的。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羌人在与秦人频繁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开发山林,发展生产,在河湟地区出现了农业<sup>[19]</sup>。但自秦国在西北崛起后,不断向外扩展领域,并吞了附近许多小国或部落。羌人也同样受到秦国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从公元前四世纪末叶秦献公时起,一部分羌人开始向西南及西北大迁移。有的迁到岷江上游、大渡河和安宁河流域。

汉代以后,我国西北部的羌人又经过两次较大的迁徙,来到岷江上游地区。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隋唐时期。当时,党项羌在西北的兴起将

影响扩展到了岷江上游的松州(今松潘)等地,并与岷江上游的白苟、哥邻等所谓“西山八国”羌人部落联结(“西山”指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的统称)<sup>[19]</sup>。隋唐时期由于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我国西北部河湟一带的羌人,如党项羌等,都相继内迁,其中一部分到了岷江上游的松州、茂州一带。这些人逐渐成了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主体民族。

隋唐以来,岷江上游一带的羌人,处在汉族和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人之间,成为汉族和吐蕃联系的纽带。在经济上成为茶马互市的主体,使社会发展迅速。由于经济、政治联系的密切,这些地区的羌人,至唐初起就有很大一部分要求“入籍”,成为唐王朝管辖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处于吐蕃政权的统治之下。这样,历北、周、隋、唐王朝,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广大地区的羌人,大都同化于汉人和吐蕃人之中。到了宋代,我国境内的古羌人,除在岷江上游还有一些聚居的村寨,继续保持着古羌人的某些基本特点外,其他地区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的各族或者先后融合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中<sup>[20]</sup>。因此,今日岷江上游的羌族是移入民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后形成的混合体,这从该地区羌语的混杂程度可窥一斑,即羌语在这一狭小地区可以分为南北两大方言,除茂县部分地区和黑水县的羌民讲北部方言外,其余均讲南部方言<sup>[17,20]</sup>。而且即使邻近的一些村寨之间,语言也不能完全相通。这表明他们族源的不一致和山区地理隔离对多样性保存的作用。

## 2.1.2 岷江上游的藏族

公元七世纪初叶,吐蕃逐步统一并巩固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后,不断对外用兵,先后征服、统治了今四川、甘肃、青海等藏区的各部落。并在这些地区安置移民和派军队驻守。例如,在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20余万人屯于松州西境,出迎公主<sup>[21]</sup>。吐蕃王朝崩溃后,这些地方的军事首领和长官各据一方,成了当地的世袭土官,同时遗留的军队及家属成为该地区人口增长的重要部分。这些地区,主要以宗教文化为中心与吐蕃文化维系着密切的联系,并经过一千多年的变迁,逐渐形成今天岷江上游地区的藏族。

但岷江上游的藏族又可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分布于松潘草地上讲藏语安多方言、以牧业作为生计的安多藏族,二是分布于黑水、理县等高山峡谷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或半农半牧,讲藏语嘉绒方言的嘉

绒藏族。这两大群体的迁入和随后的涵化过程是不同的。松潘是于唐代宗广德初陷于吐蕃,直到元代,这一地区仍属吐蕃等处宣慰司<sup>[22]</sup>。松州的藏民被称为夏尔巴人,其原因是松赞干布同唐朝开战时期,从上部阿里地区一个叫做夏尔巴的大村落开来一支庞大的部队驻扎在松曲河一带地区戍边,迄今他们进驻该地区已有1300年左右<sup>[18]</sup>。由于草地的开阔性以及游牧民族的大范围移动,这一群体与草地上的游牧部落保持着长期的密切联系,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均很小,与藏族分布的核心区域具有一致性。

在理县、黑水和汶川县的部分地区居住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嘉绒藏族,草地称这一地区的藏民为“戎巴”。据汉文史料记载,古代生息、活动于今阿坝州地区东南部河谷一带,称之为“嘉良夷”、“白狗羌”、“哥邻人”、“戈基人”等羌、氏、夷部落,为这一地区的古代先民。七世纪初叶,吐蕃松赞干布统一了吐蕃,嘉绒地区也统一于吐蕃版图之中,由赞普的将领充任嘉绒各地首领<sup>[23]</sup>。由于吐蕃的驻军与移民,使原住民与迁入民充分融合,加之高山峡谷区的天然地理隔离作用,使其成为今天特有的嘉绒藏族。

## 2.1.3 岷江上游的回族

唐朝时期,岷江上游的松州(今松潘县)、理番(今理县)就是封建王朝设在川西北的重镇,这些地方不仅成为“茶马互市”的繁华集镇,而且是朝廷屯兵的关口要塞之地。因此,它吸引了不少的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他们在此地生活居住,讲经传道,繁衍子孙,成为居住在岷江上游最早的回回民族。

1219年元世祖(成吉思汗)统一部落,派兵南下,经陕西、甘肃路过松州,设立松潘卫,为加强防卫,从甘肃等地胁迫部分波斯、阿拉伯商人(当时统称色目人),来松州筑城<sup>[22]</sup>。由于筑城任务大,时间长(大约60a),这些色目人再无力返回原籍,便在松潘定居下来。同时,由于汶川、茂县是通往“茶马集市”——松潘的交通要道,因此在明洪武年间也有不少的回回商人远道而来,贸易经商<sup>[24]</sup>,这样在岷江沿岸的杂谷脑、松潘、汶川、茂县就出现了不少回族聚集点。

## 2.1.4 岷江上游的汉族

唐蕃屡次战争,历时二百年之久。由于松潘是西山商路上的重要集镇,这时它不仅是双方屯兵的关隘,而且成为战争的辐重、给养物资和各种商贸物资的集散地。由此引来大批军士、商人统一驻扎。

其中汉族人数众多,他们成为较早进入岷江上游地区的汉族人。宋朝开始,不少汉族移入羌区,并在此定居。宋太宗雍熙时(公元 984 年~ 987 年),茂州(今茂县一带)已有汉民 326 户,霸州(今理县甘堡)的汉民已有 170 户<sup>[18]</sup>。

明末清初,又有三次较大的移居。清初,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开始,部分来川省的开垦者也来到了羌区,茂县交通沿线的羌民中,长期流传着“从湖广迁来”的说法也缘于此。“改土归流”从清乾隆至道光一百多年才完成,经过改土归流的汶川、茂县,土司制度基本废除(汶川瓦寺土司例外)<sup>[24]</sup>,土地走向集中,使具有农耕文化传统的汉族能在此迅速发展。至道光年间,茂州一带(包括黑水)已有汉人聚居的九村落和汉羌杂居的二十六村落。清时,汶川已有汉人聚居村落 60 个<sup>[18,24]</sup>。

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地方军阀势力逐渐延伸到阿坝州。红军长征后,更使国民党势力大量移入,使

各行业的汉人均有涉足。这时,理县的杂古脑成为商贸中心,产烟季节商人络绎不绝。有的甚至定居下来开荒种烟,开设店铺,成为当地的垦民和坐商。

2.2 岷江上游民族的地理分布

羌族是岷江上游地区民族构成的主体,人口接近 15 万,主要分布在以茂县为中心的河谷地区,包括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和黑水河的干旱河谷核心区域,其分布地域与干旱河谷生态系统具耦合性。羌族聚落的分布海拔多在 2500 m 以下,这一方面与羌族的土地利用传统有关,另一方面是由于羌族在该地区的居住历史最悠久,先占据了生物生产力高的区域,保证了民族人口的持续增长。因此,虽然茂县是羌族分布的中心,但这种分布格局在水平上为偏心的同心圆状,即羌族往茂县以上的分布是迅速减少,而向茂县以下的区域则分布扩散距离很远,使汶川和理县均有数量可观的羌族分布。

表 1 岷江上游人口及其民族组成  
Table 1 Population and ethnic groups on the supper Minjiang River

县别 County	总人口 Population	藏族 Tibetan		羌族 Qiang		回族 Hui		汉族 Han		其他民族 Others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No.	%	No.	%	No.	%	No.	%	No.	%
汶川县 Wenchuan	108671	18806	17. 3	32890	30. 3	1300	1. 2	55219	50. 8	456	0. 4
茂 县 Maoxian	100245	1978	1. 9	89553	89. 3	2035	2. 0	6628	6. 6	51	0. 1
松潘县 Songpan	67266	26326	39. 1	5615	8. 3	9568	14. 2	25724	38. 2	33	0. 1
黑水县 Heishui	56181	51367	91. 4	439	0. 8	64	0. 1	4301	7. 7	10	0. 0
理 县 Lixian	42580	20259	47. 6	13643	32. 0	180	0. 4	8445	19. 8	53	0. 1
合 计 Total	374943	118736	31. 7	142140	37. 9	13147	3. 5	100317	26. 7	603	0. 2

藏族的分布区域通常要高于羌族,这是与藏族的游牧传统以及藏族对该区域羌族的征服历史相关的。羌族虽然传统上也带有游牧性,但该区域的羌族有传统从事农耕的土著民成分,具有利用河谷区进行农耕生产的经验。同时,唐蕃征战以来,吐蕃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统治该区域的主要力量,吐蕃遗民借助军事优势自然就会抢占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吐蕃的军事力量曾经盛极一时,但无论是攻占长安还是成都后,吐蕃人均主动退回高原,这表明吐蕃人对高原的适应以及对高原本身的控制意

识。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藏族的势力范围总是与青藏高原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也有人提出过藏族文明发展的东向性问题<sup>[21]</sup>,但藏族文明始终很难跨越青藏高原的东限,使自然地理界限与政治地理界限重叠。

由于嘉绒藏族具有藏族与羌族之间的过渡性,因此他们通常是半农半牧的,并且对高山草场的依赖性远不如松潘地区的安多藏族。在藏语中,“嘉绒”解为“靠近汉地之农区(人)”<sup>[19]</sup>,这就表明了他们的地理方位与土地利用方式。嘉绒藏族作为一个

融合体,其实是高山峡谷区这一特殊环境条件产物,即在土地利用上具有羌族的农耕性,又具有藏族对高山草场利用的方式,才可能对这一特殊生态环境中的土地资源进行更充分的利用,因此涵化过程就从一种偶然变为必然。

松潘的藏族虽然多已缺乏纯游牧的特征,但畜群和全家人整体的季节迁移还是保留了下来,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牧民已逐渐开始了在冬房附近的农耕生产。安多藏族在岷江上游的分布通常高于海拔 3000 m,其生存空间的下限往往决定于其冬草场的分布海拔。因此,在岷江上游从低处的羌族经嘉绒藏族到高处的安多藏族,是在垂直梯度上对从东到西青藏高原东部民族水平分布的反映。

在这一区域中汉族和回族均呈“小集中、大分散”的分布格局,这是因为过去分布于此的回汉民族均与贸易和流通有关(后期的汉族迁入与政治管理有关),物流的形成就要求有空间上分配合理的结点,能保证整个区域的流通顺畅。由于松潘在历史上是整个区域贸易的枢纽,因此松潘的回族占整个地区回族总人数的 72.7% 就不足为怪了。解放后,汶川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与对外口岸,工业企业的相对集中也导致汉族工人和干部的集中<sup>[24]</sup>。

### 3 岷江上游民族的文化涵化现象

由于岷江上游民族的迁入成分很大,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在所难免,文化的涵化也就表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

#### 3.1 住房

在住房方面嘉绒藏族与羌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嘉绒藏族居住于高山峡谷区河岸旁或半山靠水源处,三五家至数十家自成村寨。房屋为土、石、木结构,通常分三层:底层为牲畜圈、草料房,二层为居室、厨房,三层半边置阳台用于晾衣、晒粮,另半边置房为经堂。二楼主室正中为火塘,上支三脚或四脚架,可放锅放壶以煮饭烧水并可热煮猪饲料等。而羌族传统住房一般也分为两层或三层,“货藏其上,人居其中,畜圈于下”。与嘉绒藏族的不同之处在于缺乏经堂,这是由于嘉绒人在宗教上与藏族具有更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的痕迹,可能是嘉绒人被归之于藏族的关键所在。正所谓“自喇嘛教传,甲绒无国”<sup>[19]</sup>。羌人房屋中层的中间为堂屋,也砌火塘,火塘上置铜制或铁制三脚架,取暖煮饭,火

种不熄。这种对火的崇拜在所有与羌族有关的民族中均可以发现,如摩梭人、纳西人等。羌寨筑房并不择向,唯受地形限制,寨外形为基宽顶收的堡垒形状。如果将碉楼视为羌式建筑的特征,那我们在嘉绒藏区也可发现它的踪迹,因此可以认为嘉绒藏族在建筑上是师承了羌族的传统。

#### 3.2 丧葬

羌族葬式有火葬、土葬和岩葬三种。火葬为羌族传统葬式,每一家族均置有石砌围圈的火葬场,为五十岁以上病死的寿终归天者行火葬。凶死及传染病死者亦火葬,但不能进火葬场。传统的藏族丧葬主要有采取水葬、土葬、天葬几类形式,并没有火葬。但在与羌族关系密切的嘉绒藏族地区,却存在火葬。人们通常置尸体于浇酥油的架柴堆上,喇嘛敲鼓吹号诵经,生者悲戚点火,燃后收骨灰于坛内,并下坟,挂经幡。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羌族与嘉绒藏族文化上相互作用。

#### 3.3 饮食

饮食文化的形成往往与资源的供应丰富度有关,即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往往与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有关联的。羌族居住于河谷地区,热量条件较好,物产要比高海拔地区丰富,因此饮食种类也要丰富一些,主食为玉米、洋芋、小麦、青稞,辅以荞麦、油麦和各种豆类。而岷江上游藏族主食糌粑,藏族普遍喜欢的手抓肉反映出他们游牧民族的特性。嘉绒藏族与羌族在酿酒方面具有相似性,均喜用青稞酿制杂酒。而酒后所跳的锅桩也表明了两个民族的文化渊源。

应该看到,岷江上游地区的少数民族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两代以来,大量汉族农民、工匠、商人、士兵移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铁质农具代替了木质农具,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汉族人到藏、羌区开荒,引进了适合高寒山区的作物品种和灌溉方法。玉米的引种,洋芋新品种的推广,改变了过去藏、羌区以种植荞麦为主的生产状况。同时,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也造成了人口的增加,使山区的农田开垦程度大幅度提高。另外,蔬菜、水果品种的大量引进,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而且成为各族人民用以交换的主要商品之一。这些新技术、新作物的引进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 200~300a,但已成为当地农耕文化社会中的主体部分,因此,一般来说,物质文明和技术要比思想意识、宗教或语言更易于吸收和涵化。但是,也

应该看到,长期以来,由于羌族与汉族的密切交往,在交通沿线和接近汉族地区的羌民,一般都通用汉语,即使生活在高山羌寨的村民也都能同时使用汉语和羌语两种语言,这是一种典型的边际涵化现象(Marginal acculturation)。

### 3.4 宗教

民族作为集体生活的人群而具有社会性,同时作为按照共同方式生活的集体而言又是一种文化共同体,宗教信仰则是和民族紧密相关联的社会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在岷江上游地区民族之间最清晰的界标是宗教,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并以此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因此表现出的多样性也很明显。一般而言,藏族信仰藏传佛教、汉族和杂居区居民信仰道教或汉传佛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羌族信仰自己独特古朴的多神宗教。岷江上游地区由于长期的文化涵化作用,宗教信仰复杂,一个家庭中甚至可能同时有几个教派的信徒。但总的来说,宗教的独立性相对于文化中的其他成分要更大一些,甚至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即使同为佛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也是如此。

藏传和汉传佛教在地域生活环境、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形态,如寺庙建筑风格、佛像的造型色调、供仪礼乐、规章制度、饮食服饰、习修方式、宗教习俗和信仰心理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差别。岷江上游除与汉族地区接壤的汶川县河谷地带和理县部分地区信仰汉传佛教并建有相应寺庙外,绝大多数佛教徒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有许多派系,其中主要有“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格鲁派之前为“噶当派”),这四大派系在岷江上游地区均修建有庙宇并拥有不少信众。

公元9世纪本波教势力在西藏的一度胜过佛教和大量灭佛活动,导致许多宁玛派佛教僧人向东北方向迁徙,在岷江上游等地区传法、建寺。噶举派主要在十三世纪时开始传入四川西部地区的现松潘、理县等地并修建寺庙,其中不少寺庙后来由于教派斗争改为其他教派<sup>[17]</sup>。目前“噶举派”在岷江上游地区的寺院僧人不多,规模也比较小。“萨迦派”传入岷江上游地区的时间大概在13世纪中叶以后,并一度在较长时间内拥有较强的势力,但自15世纪起格鲁派的强势传入和发展对其造成了极大冲击,目前岷江上游仅松潘县存有2座萨迦派寺院<sup>[18]</sup>。格鲁派自15世纪传入岷江上游地区开始,即广建寺庙

经堂,与对立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先后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少本波教和藏传佛教其他各派的寺庙改为己派,因而具有较大的寺院规模和僧侣势力。

本波教,起源于古称象雄的今西藏阿里地区南部,是佛教传入之前藏区盛行的宗教,公元2世纪左右传播到藏东岷江上游和大渡河流域<sup>[23]</sup>。本波教至今在岷江和大渡河流域上游的嘉绒藏区还有较大的势力和较牢固的信教群众基础。本波教与世界各地的原始拜物教有相似之处,虽然已经从超越原始的自然宗教发展成为人为宗教。岷江上游历史上作为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又是中原统治阶级设立与吐蕃等少数民族地区“茶马互市”的集散地,为本波教最初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元6世纪以后,佛教从中原和尼泊尔传入吐蕃并受到当朝的竭力推崇。由于本佛冲突越来越激烈,笃信佛教的吐蕃王朝赞普(领袖)不得不下令禁止本波教,使得西藏大量本教僧侣被迫带着教义经典逃往藏区东部岷江和大渡河流域地区,并通过几个世纪逐步将东藏发展成为本波教大本营和复兴基地。自从佛教传入以后,本波教在岷江上游地区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中,经受了藏传佛教势力多次甚至是致命的冲击而得以顽强生存下来。同时,松潘一带除藏族外的不少羌族也信奉本波教,这可能是由于本波教中存在着原始宗教成分的缘故。

## 4 结论

岷江上游民族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涵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涵化是与2500年来各民族的迁徙有关,这在生活习俗、建筑风格和宗教多样性上都有所表现。由于文化群体的迁徙,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文化的多样性丰富起来,而这种文化的交错地带又与自然地理的交错地带形成了吻合。文化交流后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原有文化的稳固沿袭,二是混合后新文化特质的本地化。在第二种情况中,山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特征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研究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时,对于文化的涵化过程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因为这是理解文化多样性形成机理的关键之一。

岷江上游的羌族和藏族通过文化互动形成了新的特质,其涵化是明显的,特别是表现在嘉绒藏族这一文化群体上。而汉族却对他民族具有更明显的同化能力,特别是在农业技术层面。回族长期保持着

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稳定性较大,而回族在该地区的存在却对藏族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藏族牧区畜产品的主要中转和输出群体,在牧区与农区物资的空间联结上起着中间传输作用。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Liu Zhao-guang. Studies on the Land-use Plan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westem Sichuan. Chengdu: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of Sichuan, 1991. [刘照光. 川西北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研究[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1.]
- [2] WRI, IUCN & UNEP. Global Biodiversity Strategy - Guidelines for Action to Save, Study, and Use Earth's Biotic Wealth Sustainably and Equitably. Beijing: Standard Publishing House of China. 1993. WRI, IUCN & UNEP. [全球生物多样性策略——拯救、研究和持续、公平地利用地球生物资源的行动纲领[M].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3.]
- [3] Wang Zhen, Zhang Peiyuan, Liu Xiao-lei et al. An Important Belt of Ecological Transition 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1995, 15 (3): 319~ 326. [王铮, 张丕远, 刘啸雷, 等. 中国生态环境过渡的一个重要地带. 生态学报. 1995, 15(3): 319~ 326.]
- [4] Wu Ning, Liu Zhao-guang. Probing into the Causes of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Subalpine Vegetation o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an Plateau. *Chin. J. Appl. Environ. Biol.*, 1998, 4(3): 290~ 297. [吴宁, 刘照光. 青藏高原东部亚高山植被地理格局的成因探索[J].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 1998, 4(3): 290~ 297.]
- [5] Larkin, R. P. & Peters, G. L.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uman geograph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3.
- [6] Powell, J. W.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languag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0.
- [7] Ratzel, F. Anthropogeographie. Stuttgart: J. Engelhorn. 1891.
- [8] Boas, F. The growth of Indian mythologies - A study based upon the growth of the mythologies of the north Pacific Coas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896, 9: 1~ 11.
- [9] Lowie, R. H. The crow Indians. New York: Rinehart. 1935.
- [10] Mead, M. 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n Indian tribe. Columbia University Contributions to Anthropology, Vol. 1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 [11] Redfield,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35, 38: 149~ 152.
- [12] Sauer, C.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dispersals.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2.
- [13] Hagerstrand, T.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spatial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14] Bjorklund, E. Ideology and culture exemplified in southwestern Michiga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4, 54: 227~ 241.
- [15] John, J & J. O. Wheeler. The changing residential structure of the Dutch population in Kalamazoo, Michiga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9, 59: 441~ 460.
- [16] Jayawardena, C.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 A survey of Indian communities overseas. *Geographical review*, 1968, 58: 426~ 449.
- [17] Editorial Board of "Annals of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nals of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Beijing: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1994.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志[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4.]
- [18] Da Er-ji, Li Mao.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Aba. Chengdu: Sichuan Publishing House of Dictionary. 1993. [达尔基, 李茂. 阿坝通览[M].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3.]
- [19] He Guang-yu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i and Qiang People. Nanch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of Jiangxi. 2000. [何光岳. 氏羌源流史[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 [20] Li Ming. Literature History of Qiang Nationality. Chengdu: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of Sichuan. 1994. [李明. 羌族文学史[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 [21] Si Shuo. The History of Eastwar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Civilization. Chengdu: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of Sichuan. 1994. [石硕.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 [22] Editorial Board of "Annals of Songpan County". *Annals of Songpan County*. Beijing: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1999. [松潘县志编纂委员会. 松潘县志[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23] Que Dan. History of Jiarong Tibetan. Beijing: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1995. [雀丹. 嘉绒藏族史志[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5.]
- [24] Editorial Board of "Annals of Wenchuan County". *Annals of Wenchuan County*. Beijing: Nationality Publishing House. 1992. [汶川县志编纂委员会. 汶川县志[Z].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2.]

# Acculturation and Diversity of Ethnic Cultures on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WU Ning, YAN Zhaoli, LU O Peng, and LIU Jian

(*Chengdu Institute of B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The region on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cotone in China because of its situation i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astoral area to the west and the farming area to the east, but also a significant migration “corridor” and the transitional belt of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 This region is a ‘hotspo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the world which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s of experts at home and abroad, but the studies on cultural diversity, which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same meaningful issue as biodiversity by the world–wide elite, are just at a preliminary stage. After reviewing acculturation concept and research history brief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cculturation of ethnic cultures on the upper Minjiang River following the clues of mi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history, such as Qiang, Tibetan, Hui and Han. Having been identified as a driving force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the effects of acculturation on the occurre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ts mechanism in this region have been explored.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acculturation has been studi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and/ or the traditions of ethnic groups has been explained.

**Key words:** Upper reaches of Minjiang River; acculturation; cultural diversity